

# 抗戰時期「知識青年 奔赴延安」現象

• 王 鋒

抗日戰爭時期，尤其是1937至1939年，成千上萬的中國知識青年從四面八方湧向延安。「延安的城門成天開着，成天有從各方向走過來的青年，揹着行李，燃燒着希望，走進這城門。」<sup>①</sup>一個偏僻的西北小城，為何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知識青年為甚麼如此熱情而執著地奔向延安？

對這些問題，許多學者都做過探討。主流的學術觀點認為，大批知識青年奔赴延安，主要是因為延安作為「革命聖地」，有着國統區所缺乏的「自由」和「民主」的新氣象，有着知識份子所嚮往的獨特的「革命景象」<sup>②</sup>。這種解釋，在強調延安的革命符號意義以及知識青年對這一符號意義的認同的同時，卻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中共不遺餘力地對各地知識青年的動員和組織也是知識青年奔赴延安的一個重要因素。本文即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着力探討中共是如何動員並組織大批知識青年奔赴延安。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從保安遷往延安。要建設黨和根據地，就需要大量的各方面的幹部和人才。剛剛經過長征，隊伍大量減員的中共，做出了大量吸收外來知識青年到延安的決定。

## 一 幹部缺乏與中共知識份子政策的轉變

1936年12月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國共兩黨開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1月，中共中央從保安遷往延安。沒有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軍事問題暫時成為次要問題，而黨和根據地的建設則成為中共的頭等大事。要建設黨和根據地，就需要大量的各方面的幹部和人才。剛剛經過長征，隊伍大量減員的中共，在幹部與人才方面，是極度缺乏的。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顯然，僅僅在人口稀少、文化落後的延安，很難在短時間內培養足夠的幹部和人才。於是，中共中央做出了大量吸收外來知識青年到延安的決定。

\* 在本文修改過程中，任玲玲老師、胡其柱老師和荊世杰博士均提出了寶貴的意見，筆者在此表示真誠的感謝。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大量吸收外來知識青年，與其知識份子政策的轉變也有很大的關係。中共在初創時期，其黨員絕大多數是知識份子，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中，也曾大量發展知識份子入黨<sup>③</sup>。但是在大革命失敗以後，尤其是1928年中共六大以後，黨內「左」傾路線佔了統治地位。「唯成份論」盛行，過份強調單純工人成份的意義，對知識份子極度不信任，並不加區別地將知識份子等同於機會主義者。當時的黨中央認為：「我們黨內的知識份子，在目前整個的革命潮流中或完全消極，或者公開叛變。」<sup>④</sup>1935年遵義會議以後，中共開始從各方面肅清「左」傾錯誤。同年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明確將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一起視為中國革命的動力。〈決議〉鄭重宣告<sup>⑤</sup>：

一切同情於反日反賣國賊的知識份子，不問他們過去是否是國民黨員，或是在國民黨政府中工作，都能享受蘇維埃政府的優待……一切受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國民黨政府所驅逐、輕視與虐待的知識份子，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技術人員與新聞記者，蘇維埃給予託庇的權利（一切這些人都可到蘇區來）。

1937至1939年，國共關係尚屬良好，所以中共大量公開或半公開地動員和組織知識青年到延安去：一是指示各地黨組織和救亡團體大力輸送知識青年到延安；二是在延安設立各類幹部學校以招收青年學生。

從此以後，中共的大門重新向知識份子敞開。大量吸收外來知識青年到延安，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

## 二 中共對知識青年的動員和組織

1937至1939年，因為國共關係尚屬良好，所以中共利用其合法地位，大量公開或半公開地動員和組織知識青年到延安去。其主要方法有二：一是指示各地黨組織和救亡團體大力輸送知識青年到延安；二是在延安設立各類幹部學校以招收青年學生。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中共中央曾不止一次指示各地各級黨組織動員和組織知識青年到延安學習<sup>⑥</sup>。對救亡團體，黨中央也有所指示。據于光遠回憶，1937年彭真在山西遇見他時交代了兩件事，其中第一件事是：「他告訴我黨中央決定在延安辦一所『陝北公學』，吸收國民黨統治區的知識青年和知識份子來受教育，把他們培養成為我們的幹部。……民先不要只顧在外面（指國統區）開展青年工作這一頭，還應該把動員青年到延安去，特別是進陝北公學去，作為任務之一。」<sup>⑦</sup>

各地各級黨組織、黨員和各救亡團體接到中央的指示後，便利用各種方式，大力動員輸送知識青年到延安學習。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的徐特立經常給年輕人作報告和演講，號召「有志青年到延安去」<sup>⑧</sup>。據時在長沙市兌澤中學讀高中的樂山回憶，1938年的一天，徐特立在湖南省府附近的六堆子巷演講，「那天他講了抗日戰爭發展的形勢，指出中華民族處於危亡之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號召青年學生到延安去，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並且說，去延安學生可以保送進抗日軍大或延安公學」。在徐特立演講的感召下，「我和一些同學當場報名」<sup>⑨</sup>。共產黨員作家段雪笙在山東各地以教師身份作掩護，向學生宣傳共產主

義思想和中共的政策，以此影響學生的思想，組織輸送大批的知識青年到延安學習<sup>⑩</sup>。中共綏蒙地區各級黨政軍負責人姚哲、楊植霖、奎璧、賈力更、李森、勇夫、趙誠、恆升、武達平、劉洪雄、于占彪、白成銘、張祿等對進步青年進行說服動員，精心組織，派大青山騎兵支隊和游擊隊護送，曾先後動員和組織了9批蒙古族及部分漢、回、滿族革命青年，共100多人到延安學習<sup>⑪</sup>。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民先隊）總部不僅將大批民先隊員送往延安，而且還在各地動員知識青年，組織他們到延安學習。僅1938年5至8月，民先隊總部就組織了107人奔赴延安<sup>⑫</sup>。湖南的文化界抗敵後援會（文抗會）也經常介紹和推薦進步青年到延安去，康濯、柯藍、楊迪、張正文、彭輝、楊光等都是通過文抗會的關係而奔赴延安的<sup>⑬</sup>。東北救亡總會及其各地分會在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抗日救亡工作的同時，也不斷向延安輸送青年學生。1938年5至8月，東北救亡總會西安分會就向延安輸送了知識青年50人<sup>⑭</sup>。

在延安創辦各類幹部學校，是中共吸收外來知識青年的最主要途徑。抗戰期間，延安先後成立了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抗大）、陝北公學（陝公）、魯迅藝術學院（魯藝）、中國女子大學等十幾所幹部學校，這些學校大都面向全國招生。為了讓根據地以外的知識青年更多地了解和報考這些學校，中共多採取以下措施：一是利用黨報黨刊以及進步人士所辦報刊介紹這些學校。如陝公創辦之時，《新中華報》曾作了連續報導，不僅刊登了招生簡章，而且對其籌辦情況也給予了詳細介紹。進步人士鄒韜奮主辦的《抗戰》三日刊，連載了舒溼的〈邊區實錄〉，對陝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眾運動等方面的情況作了系統報導，並刊登相關內容，介紹投考這些學校的途徑。鄒還專門撰寫時評〈青年的求學狂〉，詳細介紹了陝公的特點<sup>⑮</sup>。二是利用國共合作的有利時機，令各地方黨組織以及南京、武漢、西安、重慶等地的八路軍辦事處（八辦）和通訊處，廣泛散發這些學校的招生廣告和招生簡章，積極宣傳其辦校宗旨。1938年春，中央電示東南分局多招收南方學生，電文如下<sup>⑯</sup>：

南方學生來得很少，因此，改變方法，不必舉行考試，也不必介紹信，立即通知各地黨部，左翼團體，同情者，向外放出空氣，凡純潔能吃苦耐勞者，不拘年齡，性別，職業，學歷均可自動北來入學，並告以如隴海路線斷，由西汗公路步行來。如西安不守，繞道陝南陝甘邊區寧縣，寧縣到慶陽，找八路軍，如武漢不守，走四川來，路上有人攔阻，別〔此處似應為「則」〕繞過之，步行每日路費至多五角，四川學生多由成都步行，走卅天，路費十五元，坐車則費六十元，淮北由漢口步行，恐亦不過此數。來時可三四人或七八人十餘人一組來，此種自由入學辦法，當然會混入一些壞份子，但抗大第三隊七百學生中，均如此來，僅卅幾個壞份子，不足廿分之一，不足慮，並告以保障學業，來此不拒，一律收容，學習時間三個月至六個月，畢業後工作可自由選擇，願回家工作者，路費酌由學校發給。

經過中共的大力宣傳動員，各地知識青年紛紛報考抗大、陝公等學校，而設在各地的八辦則專門負責接待願去延安的青年。由於青年踴躍報名，所以八

為了讓知識青年更多地了解和報考延安的幹部學校，中共利用黨報黨刊和進步人士所辦報刊介紹這些學校，以及令各地方黨組織及八路軍辦事處和通訊處，廣泛散發這些學校的招生廣告和招生簡章，積極宣傳其辦校宗旨。

一開始，西安特種會報並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各地知識青年仍源源不斷地湧向延安，引起了國民黨最高層的注意。特種會報遂作出決定，各地到延安去的青年學生，一律堵截扣留。

辦的工作異常繁忙而緊張。尤其是西安八辦(西安是通往延安的必經之路)，每天都需要接待大量的青年。因為人數太多，處長伍雲甫不得不在門口接待。為方便知識青年報考，1938年4月，抗大、陝公等校都在各地八辦設立了專門的招生點。中共中央還批准各地八辦成立「招生委員會」，專門負責安排各地青年到延安學習和工作。從1937年到1938年上半年，各地八辦源源不斷地向延安輸送知識青年。據統計，1937年秋，蘭州八辦共培養和輸送進步青年3,000人到延安<sup>①</sup>。1938年3至5月，武漢八辦介紹了880人赴延安學習<sup>②</sup>。重慶八辦也先後輸送了2,000多人到延安<sup>③</sup>。

至於1937至1939年總共有多少知識青年去了延安，由於缺乏詳細的統計資料，現已無法考證，但相關資料顯示，僅1938年5至8月間，就有2,288人奔赴延安<sup>④</sup>。而在抗大第三期到第五期的20,124名學員中，就有12,535人是外來知識青年，佔學員總人數的62.3%<sup>⑤</sup>。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地知識青年奔赴延安以前，中共還要專門對他們進行審查。通常情況下，知識青年要經過三次審查，全部過關以後，才能進入延安。審查的程序大體是這樣的：第一步，由南京八辦進行初審。一般情況下，初審比較簡單和寬鬆。凡持有各地中共地下組織或周邊組織介紹信的，基本都能通過。第二步，由西安八辦進行複審。西安八辦在接到南京八辦轉來的審幹小組對去延安人員的鑒定表以後，對持介紹信前來的人，再進行一對一的談話。第三步，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設在涇陽縣雲陽鎮的接待站進行三審。三審通過，才能最終前往延安<sup>⑥</sup>。

### 三 國民黨的阻撓

中共各地黨組織和八辦輸送知識青年到延安，一開始便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1937年10月，在西安行營的一次匯報會上，行營第二廳廳長谷正鼎說：「谷正綱由重慶來信告訴我，有好些朋友的子女都溜到延安去了，你們在西安幹甚麼的，為甚麼不採取有效辦法來制止……我們自己的兒女都不保了，都要跟着共產黨跑了，我們就坐視不問嗎？」<sup>⑦</sup>。11月初某天，谷正鼎、顧希平(西安行營第二廳副廳長)、任覺五(西安行營政治部主任)、張毅夫(西安行營辦公廳第四科科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局)西安負責人)四人在谷正鼎辦公室集會，一致認為必須採取有效辦法，制止學生到延安去。四人將意見匯報給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後，蔣立即召集西安黨政軍各方面負責人開會研討。經過幾次討論，蔣最後決定，建立特種會報，用「黨政軍各方面力量統一起來對付共產黨」<sup>⑧</sup>。11月，西安特種會報正式成立。

一開始，西安特種會報並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各地知識青年仍源源不斷地湧向延安。這一現象引起了國民黨最高層的注意。1938年1月29日，蔣介石致電蔣鼎文和陝西省政府主席孫蔚如，謂：「三原及其附近實情究竟如何，聞共產黨在該處任意活動，並公開設立學校，收容各省學生等。實情如何，希詳查實報。」<sup>⑨</sup>接到電報後，西安方面立刻作出反應：特種會報作出決定，各地到延安

去的青年學生，一律堵截扣留送交胡宗南負責的西安戰幹第四團管訓。具體的任務分配為：延安（疑為西安）、咸陽、三原通往延安的交通線，交董釗十六軍和憲兵第一團檢查哨執行；渭南、大荔以及陝甘寧邊境隴東慶陽、環縣一帶，交胡宗南駐防陝甘寧邊區的部隊執行。同時，張毅夫也指示三原組長任鴻猷、寶雞組長李樾村，以及渭南、大荔、洛川、隴東環縣、慶陽各地圍繞陝甘寧邊區的特務組織，對前往延安的青年學生，應協同當地駐軍和憲兵執行偵捕，以此作為經常的主要任務<sup>⑳</sup>。

愛國青年立力及其他102名學生就是在當年去延安陝公的途中被駐咸陽的憲兵扣留的。在關了他們十幾天之後，一個連長帶了一隊憲兵來，要脅迫他們去西安，結果遭到了學生的明確拒絕。連長老羞成怒，將40名學生強行用汽車載走，其餘則繼續關在拘留所<sup>㉑</sup>。據國民黨特務機關統計，1939到1943年間，僅在交口、碑亭、黃陵、耀縣、三原、永樂店、咸陽等盤查站被扣留的赴延安青年男女就有2,100多人<sup>㉒</sup>。

1939年11月，西北青年勞動營在西安成立，主要功用之一便是關押意圖前往延安而在途中被國民黨檢查站扣押的青年。這些青年進入勞動營以後，就必須接受長時間的勞動和思想改造，直到當局相信他們已經完全信仰三民主義、忠於國民黨及其政府的時候，才能獲得人身自由<sup>㉓</sup>。截至1940年年底，被關押在勞動營裏的青年達1,167人<sup>㉔</sup>。

在堵截扣留之外，國民黨還使用了誘騙的手段。1939年上半年，三原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專門設立了一個招待所，有一二十個人辦公。他們在四城門貼了很大的布告，上寫：「本招待所專門為青年們的出路着想，專門招待赴抗大、陝公、魯藝等校的有為青年，並非常同情這些青年……本處位址廣闊，設備周到……凡赴陝北學生一切困難，皆能代為解決。」招待所的人每晚查店，凡青年形迹可疑即行扣留，證實是往陝北去的時候，即說我們這兒也有訓練班，何往陝北去？並用一切威嚇利誘、欺騙等方法，派人保送赴咸陽國民黨辦的訓練班<sup>㉕</sup>。很多青年就這樣被他們誘騙至咸陽。1939年6月，即有200多名愛國青年被騙<sup>㉖</sup>。

在西安等地廣設學校，招收失學失業青年，也是國民黨採取的手段之一。據陝西省青年工作委員會1939年7月所作的工作總結反映<sup>㉗</sup>：

最近教廳決議增設學校，關中所有中心縣區均設中等學校……預計招生一千多名。這種計劃與國民黨特別是××派之奪取青年統治西北的野心〔是〕有大關係的。

……

某將軍在蘭州設立一中學，國立的，人數預計超過萬人，完全公費，在各偏僻的縣份招生，專門抓住青年的小的弱點，如「坐汽車不掏錢，可以白坐火車，你們還沒有見過火車呢」，「學校一切費用都是公家出」，「將來可以升軍校」，……等等，同時由軍事力量撥出大批汽車、火車，輸送學生，所以招的學生相當多。

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空前加強。中共各級黨組織、八辦、通訊處向延安輸送知識青年的交通運輸線趨於癱瘓，導致知識青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加強。中共各級黨組織、八辦、通訊處向延安輸送知識青年的交通運輸線趨於癱瘓，知識青年去延安的數量急劇下降。

年去延安的數量急劇下降。但1940年至1941年上半年，仍然有一部分知識青年在中共的秘密組織下去了延安。1940年5月1日北平偽憲警的報告即反映了中共秘密動員和組織北京大中學校學生去延安的情形。報告中說<sup>④</sup>：

據頃查本市各大中學近來屢有失蹤學生之事件發生，經調查此項失蹤學生為有組織、有計劃之密輸團體所誘惑。自共產八路虛張其所設四月攻勢後，此項失蹤學生數目亦大見激增，其活動方法如下：(一)由久參加八路軍之青年知識份子潛入市內，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如親戚、朋友、同學、同鄉)向各校學生宣傳，組織青年突擊隊。(二)由學生家中騙得金錢，以五人為一組，由小隊長領導，向密輸站進發。(三)以保定某師範、南口車站、津浦路滄縣、易縣、高碑店、栗村為集中密輸站，至站由小隊配給八路軍通行證。

王炳南〈關於南方局的一些情況〉描述<sup>⑤</sup>：

大量吸收知識青年到延安，為中共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幹部和人才，新鮮了中共的血液，壯大了中共的隊伍。知識青年在建設根據地、抗擊日本侵略者，乃至以後反對國民黨的統治和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南方局為了滿足一些青年的要求，也為了延安工作的需要，仍堅持向延安輸送青年和技術人員。為了躲過國民黨軍警憲特的盤查，我們就讓去延安的人員穿上八路軍軍裝，改名換姓，或作為隨車押運人員，或以八路軍家屬的名義，坐上辦事處的軍車公開走。這樣，國民黨的關卡就不敢過份卡了。因為，我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是得到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承認的公開合法機構，我們的軍人家屬和押運軍需物資人員去延安是合理合法的。

另外，在「皖南事變」前後，一些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暴露了身份的各大中學校的學生黨員和骨幹，也有相當大部分被疏散到了延安。雖然這一時期仍有部分知識青年在中共的組織下去了延安，但與前一階段相比，在規模與數量上，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1941年10月，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葉劍英在給劉少奇、陳毅的電報中稱：「因西安交通被國民黨嚴密封鎖，知識份子來源已斷，不但抗大三分校教育行將停頓，即軍委機關及留守兵團亦得不到知識份子的補充。提議由蘇北以至安徽各根據地招收政治純潔、體格強健、有中學校程度之知識青年600至1,000人來延，不分男女，經你們初步審查之後，即可組織成隊，經華北分批送達此間。」<sup>⑥</sup>從這份電報可以看出，到1941年下半年，國統區和淪陷區已經很少能有或者基本上沒有知識青年到延安去了。

## 四 結語

抗戰時期，中共大量吸收知識青年到延安，無論對當時還是以後，都產生了十分重大的意義。它大大提高了中共的威望。知識青年到延安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教育和學習，相當大一部分人又回到各地，組織和領導當地的革命運動。這些知識青年在各地大力宣傳延安，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為中共以後的革命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它為中共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幹部和

人才資源，新鮮了中共的血液，壯大了中共的隊伍。這些知識青年在建設根據地、抗擊日本侵略者，乃至以後反對國民黨的統治和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 註釋

- ① 何其芳：〈我歌唱延安〉，載《何其芳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174。
- ② 目前通行的黨史類著作大多作此解釋。持相同或相似解釋的學術論文有：羅平漢：〈燃燒着希望和熱情——大批知識份子奔赴抗日根據地的原因分析〉，《理論視野》，2008年第3期，頁55-57；高華：〈鳳凰衛視第233期世紀大講堂——抗戰時期的解放區教育〉（2005年7月30日），<http://gaohua.coldwarchina.com/xsyj/000051.htm>；李佑軍：〈奔赴延安探析〉，《廣東黨史》，1997年第6期，頁38-40；朱書清：〈抗戰時期青年奔延安述論〉，《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98年增刊第19卷，頁36-39；劉守華：〈70年前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黨史博覽》，2007年第12期，頁10-12。
- ③ 1921年中共一大時，全國53名黨員中，有52人是知識份子。中共第一至第五屆中央委員中，具有大學學歷的人數分別佔總人數的100%、75%、43%、53.3%和43.5%。參見周良書：〈在高校中建黨：中國共產黨建設的一個特例〉，《新視野》，2008年第3期，頁73、75。
- ④ 〈中央政治報告〉（1927年9月15日），轉引自曲峽等：《中國共產黨知識份子政策史》（東營：石油大學出版社，1995），頁38。
- ⑤ 〈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載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中共黨史教研組編：《華北事變資料選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頁32-33。
- ⑥ 楊第甫回憶道：「當時黨中央指示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要大力輸送知識青年到延安去。」詳見楊第甫：〈三去延安〉，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160；又如：「1938年3月6日，毛主席根據當時中國的局勢，電示彭雪楓，希望大力發展該區工作……並從豫南各縣應挑選一批優秀青年到延安學習。」參見朱雪河主編：《中共駐馬店市驛城區歷史大事記（1921-2002）》（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頁31；金海提到，「隨着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建立，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工委多次指示從綏蒙地區選送蒙古族青年到延安學習。」參見金海：《日本佔領時期內蒙古歷史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頁184；八路軍駐西安、重慶、武漢、桂林等地的辦事處以及通訊處，其主要任務之一便是動員和招收知識青年到延安。參見中國軍事博物館編：《勇者無畏：為國捐軀的八百將校陣亡檔案》，下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韓城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韓城文史資料彙編》，第七輯（內部發行，1987）等。另外，各地文史資料中，亦多有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輸送知識青年到延安去的記載，因較為零散且數量較多，此處不一一列舉。
- ⑦ 于光遠：〈憶彭真二三事〉，《百年潮》，1997年第5期，頁30。
- ⑧ 劉大年：〈有志青年到延安去〉，載《我親歷的抗日戰爭與研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9。
- ⑨ 樂山：〈抗日戰爭時期湖南學生幹部大隊活動紀實〉，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津市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津市文史資料》，第三輯（內部發行，1985），頁75。
- ⑩ 楊織如：〈北方左聯作家段雪笙〉，《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1期，頁129。
- ⑪ 錢占元：〈土默川兒女的延安之旅〉，《北方新報》，2008年7月16日。
- ⑫⑬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輸送青年到延安學習的部分統計資料〉，載童小鵬主編：《第二次國共合作》（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124。
- ⑭ 楊第甫：〈三去延安〉，頁160。
- ⑮ 聶長林：〈憶東北救總與高崇民同志〉，載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第三卷，〈統一戰線工作〉（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頁253；〈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輸送青年到延安學習的部分統計資料〉，頁124。

- ⑮⑯ 參見劉守華：〈70年前愛國青年的延安之旅〉，頁11；12。
- ⑰ 〈東南分局轉來延安招收南方學生指示〉（1938年3月29日），載《中共中央東南局》編輯組編著：《中共中央東南局》，下冊（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6），頁556。中央何時電示東南分局，尚不得而知，但根據此檔案透露的資訊，東南分局轉發其下屬黨組織的時間是1938年3月，那麼，中央給東南分局發電，應是在1至3月間，因不能確定其確切時間，故本文用了「1938年春」的說法。
- ⑱ 朱書清：〈抗戰時期青年奔延安述論〉，頁38。
- ⑲⑳ 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民主革命時期）》（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頁262。
- ㉑ 參見李志民：《革命熔爐》（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5），頁29-56。
- ㉒ 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234-35。
- ㉓㉔ 張嚴佛：〈抗戰前後軍統特務在西北的活動〉，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四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79），頁96；99。
- ㉕ 西安特種會報的主要內容是：西安各軍警憲特負責人均為特種會報成員；會報由行營第二廳廳長谷正鼎負責召集，每逢星期天上午在他家舉行，不拘形式，自由座談；關於共產黨、進步黨派、青年學生各方面動態，參加會報的人均有責任搜集情報，於每周集會時，用書面或口頭匯報，但由軍統局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局）西安負責人負搜集情報的主要責任；參加會報的人，必須本人出席，不得派人代表，每逢星期天準時到會，不另通知；會報記錄和決議交谷正鼎負責處理，然後匯報蔣鼎文作最後決定，再交有關單位執行。參見張嚴佛：〈抗戰前後軍統特務在西北的活動〉，頁98-99。
- ㉖ 〈蔣委員長致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陝西省政府主席孫蔚如以共產黨在三原附近任意活動並公開設立學校收容各省學生希詳查實報電〉，載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頁423。
- ㉗ 立力：〈我是怎樣被捕的〉（1938年9月22日），原載《新中華報》，1938年10月15日，第3版。轉引自共青團中央青運史工作指導委員會等編：《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十四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156-58。
- ㉘ 李狄龍：〈國民黨反動派封鎖陝甘寧邊區的活動紀實〉，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陝西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頁17。
- ㉙ 梁實秋：〈聞道長安似弈棋〉，《傳記文學》（台北），1963年第2卷，第4期，頁12。
- ㉚ 〈三民主義青年團二十九年度工作報告〉，頁53。轉引自Hu Kuo-tai,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Campu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45",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8 (June 1989): 318。當然，這1,167人並不全是前往延安的知識青年，其中還包括從延安出發準備前往國民黨區工作而被國民黨檢查站捕獲的青年，以及國民黨認為有「思想歧誤」的西北各省青年。
- ㉛⑳ 參見〈陝西省委青年工作委員會關於半年來青年工作的報告〉（1939年7月27日），載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 一九三九年（二）》（西安：內部發行，1994），頁280-81；278、279。
- ㉜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北京地區抗日運動史料彙編》，第三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頁461。
- ㉝ 王炳南：〈關於南方局的一些情況〉，載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第二卷，〈黨的建設〉（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頁280。
- ㉞ 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編，杜虹主編：《新四軍軍史珍典》（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05），頁277。